



本书获暨南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建设项目“华侨华人与中外关系”项目资助

2010年广东省教育厅重大攻关课题：南海开发与广东海洋经济建设（10GZXM84002）阶段成果

200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海上地缘安全战略研究（06CGJ011）研究成果

中国海权战略 参照体系

Reference System of
China's Sea
Power Strategies

鞠海龙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获暨南大学“211工程”
2010年广东省教育厅重大攻
200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



中青院 11 000676872

（与中外关系”项目资助
经济建设（10GZXM84002）阶段成果
略研究（06CGJ011）研究成果

中国海权战略 参照体系

Reference System of
China's Sea
Power Strategies

鞠海龙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海权战略参照体系 / 鞠海龙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161-1530-5

I. ①中… II. ①鞠… III. ①制海权-国家战略-研究-中国 IV. ①E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722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明
特约编辑 乔继堂
责任校对 周昊
责任印制 李建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7.5
插页 2
字数 273 千字
定价 5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海权”，之于陆海兼备、文明璀璨的中国，本应该是一个被最早认识的实践和理论。但很可惜，这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流行起来的国际政治概念，至今对于大多数中国人仍旧还是“生面孔”。自1840年英国海军武力叩开中国大门之后，海洋方向便成为中国地缘战略中最薄弱的环节。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更成为中国“陆主海从”文明模式彻底衰落的分水岭。新中国成立之后，朝鲜战争、中印冲突、中苏关系破裂，以及美苏冷战和中美苏（俄）大三角关系的博弈，铸成了当代中国的海陆地缘战略环境。迄今，在中国30余年改革开放以及冷战后一系列新的战略经营下，中国陆上方向的战略环境大大改善。但海洋方向却依旧面临着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复杂且一时难以突破的困境和挑战。

海权的历史影响，纵贯中国近现代170年的历史，也造就了一代代中国人迈向海洋的渴望。自1900年马汉海权思想传入中国后，探索中国海权问题的有识、有志之士虽为数不算多，却一直薪火相传。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强盛，中国国内的海权问题研究再次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相关研究成果不仅包括海军历史研究、海权思想理论研究，也有不少向国家安全、军事安全和地缘战略研究领域渗透的杰作。这些负载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历史使命的学术成果无疑将推动中国的海权思想理论及海军战略理论进一步发展和成熟。

暨南大学的鞠海龙教授是一位长期坚持海权问题研究的“70后”年轻学者。他的这部《中国海权战略参照体系》不仅总结了当代中国海权战略应当从近代中国历史中所吸取的教训，分析了海洋强国秉承传

统海权思想针对中国的一般规律，还以一个年轻学人的活跃思维和犀利视角，评析了海权在中国整体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影响。作者还超越了传统“海防”、“塞防”相互对立的思想窠臼，阐述了新时期中国北方陆疆安全和东南海洋战略之间相互倚重、相互支撑的内在联系，提出了发展海权必须强化“陆基双区”和“海基双区”的战略构想。这种将海权理论研究推向国家战略实践的努力尤其值得称道。

鞠海龙教授称我是“中国海权问题研究的先行者”，实不敢当。但海军、海权、海洋的确是我学术生涯和职业生涯的几乎全部。我所著述的20多本著作也基本都与海权有关。我了解每一位海洋问题研究者心中的蓝色梦想，理解他们为国家强盛而不懈努力的精神，也懂得他们作为中国人的独特的时代理想。基于此，撰上文以应作者写序之请，并激励后来学人不懈努力！

张 炜

2011年12月30日

于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

目 录

引论	(1)
一 探寻中国海权的思维起点	(1)
二 中国海权的纵向粗线条	(7)
三 理解中国海权的多维视角	(13)
第一章 攻与防的历史辩证	(20)
一 从海岸防御到海上防御	(20)
二 以防御为最高宗旨的海军战略	(23)
三 单纯防御的战略盲点	(25)
四 历史给后人的启示	(30)
本章小结	(31)
第二章 军事地缘战略参照系	(33)
一 分层次的军事地缘战略	(33)
二 陆海并举的军事地缘分析	(39)
三 指向全球海权的海上威力	(40)
四 传统海权的“对抗性”思维	(42)
本章小结	(42)
第三章 海权战略的内在指标	(44)
一 海权的经济利益辨析	(44)
二 海洋通道安全的战略意义	(51)
三 整体发展战略视角下的中国海权	(55)
本章小结	(56)

第四章 中国海权的外部环境	(57)
一 转换中的亚洲海权地缘格局	(57)
二 海洋霸权的强大压力	(68)
三 复杂的周边战略环境	(79)
本章小结	(86)
第五章 近海安全的战略假想敌	(88)
一 对手徘徊于海陆之间的历史	(88)
二 复杂而坚定的海权内动力	(110)
三 多层次、立体化的战略实力	(117)
四 近海安全必须承载的战略压力	(136)
本章小结	(142)
第六章 远洋海权的战略竞争者	(144)
一 远洋进攻型海军的发展轨迹	(144)
二 稳西南、东挺进的海权地缘战略	(152)
三 扎实而稳健的可持续力	(157)
四 日趋协调的外部战略环境	(163)
五 远洋安全面临的战略挑战	(178)
本章小结	(180)
第七章 海权地缘战略分水岭	(182)
一 两岸关系中的美国因素	(182)
二 宏观扫描与微观情怀	(195)
三 复杂而非常态的对立关系	(199)
本章小结	(202)
第八章 海权战略环境的内圈层	(204)
一 影响海权环境的南海问题	(204)
二 南海地区事务的发展	(210)
三 纠结于南海争端的伪命题	(214)
四 南海争端的未来	(218)
本章小结	(220)

第九章 海陆双基的综合分析	(221)
一 寻求恰当的战略原则	(221)
二 海权战略的地缘政治支点	(227)
三 近海安全的国际战略解析	(231)
四 海权战略的推进序列	(236)
本章小结	(243)
结论	(245)
参考文献	(247)
后记	(268)

引 论

一 探寻中国海权的思维起点

海权问题是理解中国总体战略发展与转型的一个独特视角。中国是东亚大国，一个历史上主要以陆权特征展现国家特色的古老大国。然而，从19世纪海洋文明涤荡东方以来，海洋强国的梦想就一直萦绕在中华儿女的心中。所谓“海洋强国”，其实不仅仅表现在一个国家与海洋的关系方面，也表现在它作为一个世界成员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因为海洋连接了中国与世界，所以当今中国已经不可能离开海洋而单纯地从陆地发展的角度探讨自身的未来。

实际上，中国在改革开放之际就已经开始海洋强国的战略发展。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不仅拥有了世界级的远洋商船队，而且与全球经济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经济生活的全球延伸必然导致社会生活的全球化。当今中国已经再度成为一个兼容各种经济生活、社会文化的国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胸襟广阔、不拘一格、兼容并蓄是海洋的特征，也是海洋文化的特征。虽然今日的中国尚不是一个海洋强国，但是它已经具备了成为海洋国家的基本条件。

然而，中国的海洋强国之路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从历史上看，血腥和暴力充斥传统海洋强国的发迹史。从现实角度分析，唯权是举、唯利是图又写满当今世界海洋霸权国家和海洋后进国家的宣言簿。中国沿着历史和现实海洋强国的既有模式前进，必将遭遇种种冲突。中国寻求新的战略方向却又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世界各国以传统海权战略模式对应的压力。

实力是改变境遇的前提。中国唯“先破而后立”方能从整体改变世界海洋战略的既定游戏规则。抱有为世界和平而努力的理想，需要拥有能够给世界带来和平的能力。中国的战略设计需要首先确立实力基础。

这个实力基础需要能够为中国走向海洋强国提供足够的支撑，为中国改变当今世界海洋战略环境创造条件，同时还能为中国海洋战略的理想主义开辟道路。为寻求海洋强国战略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平衡，中国需要最完美地优化过程。

适应这一高难度的战略平衡，以“海上地缘安全”为首要目标推进宏观战略进程，应该是中国海权战略过程优化的起点。中国海上地缘安全战略是基于近代历史、地缘政治理论、当代中国战略发展环境三大战略参照系而提出的战略分析与对策研究框架。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在从陆地向海洋的转型过程中。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是中国作为单纯的陆地国家被逐渐否定并逐渐认识到海洋重要性的过程。甲午战争至抗战胜利是中国作为陆地大国被海洋国家全面侵略而已经开始从战略高度审视海洋与中国关系的过程。近代历史昭示了海洋对中国的重要性，也昭示了中国传统海防战略的缺陷。“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近代中国海防战略的教训构成了当代中国权战略的第一大战略参照体系。

当代地缘政治思想萌芽于新航路开辟之后，发展于殖民主义大行其道之时，升华于19世纪末，繁荣于20世纪。地缘政治理论是人类海上交通的繁荣与发达在将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衍生出若干与海洋有关的特殊地理政治理论。在人们为了各自的国家争夺世界资源和权力的斗争过程中，“海权论”、“陆权论”、“空权论”等地缘政治学说相继问世。

地缘政治学说是以不可再生、不易变更的地理要素为对象，以权力决定利益的传统政治思维为指导，以战略对抗和冲突为内容，在总结众多地缘政治现象的基础上演绎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分析架构和模式。由于这些观点适应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国际社会日趋极端的权力冲突，因此，这些以利益对立和权力对抗为特征的学说也以其独有的特征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世界。

地缘政治理论的“海权理论”直接催生了20世纪上半期各强国的海军军备竞赛。陆权理论的“生存空间论”直接影响了德国对欧洲和非洲的扩张。世界两大阵营在中欧的对峙与“枢纽地带理论”不无关系。“边缘地带理论”宿命似地影响了中东、印度、东南亚、朝鲜半岛国家等众多国家的命运。

20世纪后半叶，世界被两大对立阵营分割成不同的世界。地缘政

治的绝对对抗性特征开始戏剧性地呈现出收敛的态势。核战争对世界的绝对毁灭和以西方世界为首的经济体之间产品市场的层级划分改变了地缘政治的理论基础。核战争的“零和”结果为地缘政治的对抗程度规定了底线。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所引生出的国家间相互依赖关系削弱了地缘战略要素特有的利益绝对性。地缘政治权力和利益的非绝对性和可替代性降低了地缘政治要素引发绝对冲突的可能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战略背景的变化并没有顺理成章地产生出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在决策特定地缘战略要地得失过程中的妥协性结果。中东局势、朝鲜半岛形势、北方四岛问题、中日东海划界、独（竹）岛之争、克什米尔问题以及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地缘热点问题的存在和久拖不决，恰恰体现着传统地缘政治“对抗性”思维的惯性力量。当代世界地缘战略背景的变化和地缘政治“对抗性”思维的延续成为直接影响中国海权战略的第二大参照体系。

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时至今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的改革成就与中国的总体发展战略有密切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坚持的“韬光养晦”战略和解决领土争端问题“搁置争议”等方针为中国赢得了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

对中国而言，发展与国际战略环境是两个相互悖谬的命题。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必然会引起内部和外部的变化。稳定的内外环境为中国积累实力，调整内部结构创造了条件。然而，力量的积累和发展壮大本身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变量。这个变量不仅改变着一个国家的内在结构，而且必将引起外部环境的变化。随着中国市场对世界经济影响力的增强，随着中国海上力量从商业力量的强大转向军事力量的拓展，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国经济、文化联系的加深，中国不仅需要从加强自身国防安全角度调整某些战略政策，而且需要从更多承担国际义务角度对已有的战略设计进行适当的调整。

庞大的世界商船队，高度外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拥有广阔内陆腹地和市场的中国提出了走向海洋的战略需求。^① 历过30多年改革开放的积

^① 中国大陆海岸线1.8万公里。

累，中国已经奠定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扎实基础。今日之中国已经有条件、也有能力成为世界级的海洋强国。

然而，中国走向海洋却不得不面对一个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整体战略上深受美国亚太战略影响的，起自日本列岛，中经我国台湾，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在内的东亚外缘岛链的包围。在美国亚太战略针对中国、台湾问题悬而未决、南海问题千头万绪、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深受中美关系影响的前提下，如何面对种种地缘战略挑战，如何走向海洋，成为中国地缘战略设计不得不回答的问题。战略发展对稳定的内外环境的需求，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对现实环境的压力，中国走向海洋强国的地理基础与地缘战略困境彼此影响、相互作用，形成构想中国海权战略的第三大参照体系。

17世纪之后，可以完全摆脱世界影响而获得独立发展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进入20世纪，世界已全然融为一体。没有一个地区可以逃脱世界霸权的影响，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无视世界强国的存在而构想自己的强国之路。中国30年发展创造的财富总量和科技突破在相当程度上冲击了亚太列强在中国百年积贫积弱条件下构建的东亚战略格局。中国崛起对东亚战略格局的冲击势必会引起既有格局利益获得者的反应，甚至敌视与攻击。

一般而言，区域性的战略格局是特定时期相关地区各国力量对比关系以特殊形式的显现。由于国家发展的动态特征是固有的，因此区域战略格局也是动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基于冷战的考虑，一直致力于经营欧洲和亚洲。苏联解体之后，世界客观上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以欧洲和亚洲为两翼，以中国、俄罗斯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为基础的世界权力与财富控制体系。

回顾美国的战略经营过程，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使美国获得了向欧洲和日本进行产业转移、同时升级本国产品梯次的绝佳机会。欧洲和日本的崛起，以及紧随其后的亚洲国家的发展，奠定了美国产品牵引世界产品市场梯次结构的基础，也确立了美国—欧洲、日本—亚洲、南美洲、非洲国家之间不平等的相互依赖关系。美国的海洋霸权就建立在这样一种具有全球性、结构性优势的经济基础上。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海洋霸权国家。它不仅拥有最先进的海军装备,最强大的海上攻击力量,为数最多的海外军事基地,而且拥有可以有效威慑几乎所有海上交通要道的战略能力。美国军事力量和战略影响力的存在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构想海洋强国战略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如何处理海权战略与海洋霸权的关系,如何为中美两国的海洋战略关系定性,如何为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定位,如何在和平发展的总体战略框架下实现中国海权的和平推进等一系列问题,将成为中国海权建设之前必须梳理的战略问题。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却非唇齿相依。明治维新至20世纪中叶,日本一直致力于以“脱亚入欧”的方式,以侵略朝鲜半岛、中国、东南亚诸国的实际行动,显示其作为“欧洲国家”对亚洲“美意”^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战略定位游离于欧亚之间,偷生于美国核保护伞之下。直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才在美国战略收缩的大前提下,重新走上影响亚洲战略格局的舞台。其后,日本效仿美国,通过产业升级和将淘汰产业向东南亚地区转移的方式构建了亚洲地区经济的梯次结构,以及不均衡梯次结构下的相互依赖关系。

凭借科技实力的发展和经济力量的膨胀,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约束,逐渐向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发展。战略重新定位后的日本提出“脱欧入亚”的说法。然而,日本并没有决心彻底回归亚洲的母体。直至目前,日本不仅无法彻底切割与美国的关系,而且从未对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作出准确的关系定位。日本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一直从属于美国亚太战略,而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和东北亚国家的战略定位也同样没有摆脱美国亚太战略的框架。怀有统领亚洲的宏志却只能暂时屈居美国手下的二等强国——日本,无疑是中国未来海权战略发展的劲敌。日本之于中国的战略挑战及其国际战略特有的矛盾性,是中国整体战略从陆地走向海洋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印度是中国的邻邦。印度与中国有无法割裂的文化联系,也有因领土争端而引起的矛盾和冲突。中印之间本无实质性的战略对立和竞争。

^① 即日本宣扬所宣扬的“大东亚共荣”。

然而，两个大国的崛起和发展无疑都将改变亚洲的未来。印度对印度洋影响力的增强，中国海军战略影响力覆盖孟加拉湾、远涉印度洋的态势，无疑为两国在未来的合作与竞争中带来种种不确定因素。如何看待必经印度洋的中国远洋船队和油轮的安全，如何看待中国与孟加拉湾周边国家的关系，如何看待印度的东进政策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中国海洋战略设计过程中不可避免要面对的问题。

美国是亚太海权的霸主，日本是美国支持下东亚海权的觊觎者，印度是扼中国海洋经济生命线的印度洋海权强国。美国与日本、印度与美国、日本与印度三重双边关系既不平衡，也不完全和谐，彼此之间也存在种种冲突和矛盾。然而，这些国家在中国战略崛起的过程中，在面对中国海权战略发展的过程中，却存在着共同的战略忧虑。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对中国政策以及相关战略，构成了思考中国海权的第四大战略参照体系。

自古以来，中国与海洋的关系都表达得相对间接。这有中国的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地理因素的影响。“第一岛链”将中国近海与远洋隔绝的状况既给中国带来了安全屏障，也制约了中国海洋文化中的冒险与进取精神。^①明永乐大帝之后中国政府海洋力量的废弛和清初“片板不得入海”的禁令切断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削弱了中国对“第一岛链”国家和地区的影响。17世纪以来，西方列强经印度抵东南亚地区。各列强占据岛礁、屠戮原住民、建立殖民地等行为，逐渐将原本拱卫华夏大地的天然屏障变成向东亚大陆发起攻击的前沿阵地。从此，“第一岛链”诸国的战略倾向性成为决定东亚海权地缘格局的关键。

20世纪以来，中国对“第一岛链”的影响力仅仅残留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位于“第一岛链”中心的台湾，一个是贴近“第一岛链”各国的南中国海。然而，台湾自光复以来一直游离于中国的战略母体之外，

^① “第一岛链”是西方国家基于自身所处战略方位和地缘政治角度而提出的概念。这一概念后来被亚洲学者援引以界定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状况。多年来，国内海权问题研究和地缘政治学者也多用此概念来分析中国海权地缘战略状况。近年来，一些国内学者基于“二战”期间这一概念的缘起等问题对国内学者使用这一概念是否妥当提出质疑。考虑到美国、印度、日本等在海权战略方面与中国存在利益对立的国家仍然将“第一岛链”视为遏制中国海权的重要地缘政治条件，本书仍用这一概念表述某些理念。

体现南海海权的南沙诸岛又多为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所占据。台湾的统一和南沙主权争议问题的解决成为中国海权战略从起步到拓展的两大难题。这两大难题虽然没有历史的教训那样刻骨铭心，没有西方传统海权理论与地缘政治理论那样引人深思，没有区域内外强国的压力那样触目惊心，也没有中国和平发展与海权需求的战略矛盾那样难以拿捏，但是它们却集中了所有中国海权战略的困惑、忧虑，以及种种难解的谜题。这两个问题无论哪一个都会聚了前四大战略参照体系的内容。它们既是中国海权战略发展的里程碑，也是检验其他战略参照体系的试金石。从这个意义上讲，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的状态和发展趋势无疑将是中国海权战略的第五大战略参照体系。

历史的教训、现实压力、大国战略目标的需要、和平发展战略的诉求相互交织，构成对中国海洋战略有重大影响若干参照系。对于战略上转向海洋的中国而言，历史上保守的海防战略已经经历了面对战略竞争对手攻势海权战略的挫败。现实中单纯的和平发展战略正遭遇到周边国家和区域外强国相互呼应的种种压力。面向未来，中国以西方海权战略为模板采取激进的攻势战略又必然会激起美国等海上战略强国的强烈反应，甚至严厉打压。因而，既要实现总体战略的转型，又要避免周边战略环境的高度恶化，成为中国海洋战略总体设计的两条底线。

实现地缘战略从陆地向海洋的转型，必须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权战略；避免周边战略的高度恶化，必须满足中国海权战略的转型不仅符合中国利益，而且要符合地区利益的要求。因而，探讨中国的海权战略不应当仅仅停留在概念的探析上，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原则的规范上，更重要的是要清楚中国的海权包含哪些层次，指向什么范围；要清楚中国在什么层次上要采取什么原则；哪些原则是应当具有协调性的，哪些原则必须是刚性的；中国的海权对哪些地区要“志在必得”，对哪些地区须“合作共赢”；中国海权战略的真正对手是谁，谁是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谁有可能转变成战略合作伙伴，而谁又可能从盟友转变为敌人……

二 中国海权的纵向粗线条

为了厘清中国海洋战略转型中的种种问题，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在不

同历史阶段，当代部分学者在学术生涯的特定时期，均提出过一些观点和看法。海洋作为一个战略问题被提到中国决策层的议事日程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其后，中法战争催生了中国经略海洋的决心，并直接推动了北洋舰队的建立。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单纯的海军建设并不是海权战略的全部。一个国家战略上向海洋的转变，除了海军建设，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

19世纪末，美国马汉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一书迎合了中国寻找海洋战略转型失败教训的需求。1900年，上海《东亚时报》以“海上权力要素论”为题连载了该书的第一章。此后，《新民丛报》、《华北杂志》、《海军》和《时报》等报纸刊物相继刊登许多相关文章。^①西方的海权思想第一次被引入中国。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专门成立了“海军部”。孙中山以其宏大的战略视野第一次从全球视野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概述了海洋与中国关系。他指出：“所谓太平洋问题，即世界海权问题”，“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谁握此门户，既有此堂奥，有此宝藏”，倘海洋不保，“则中国危矣”^②。

1927年，中国内战平息。中央政府的重新建立为中国人再度探讨海权问题提供了条件。12月《海军期刊》从1卷6期起重新连载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1660—1783》“海上权力要素”部分。《海军杂志》、《海军整建月刊》等刊物也都在同一时期刊载了大量介绍近代世界海军战史、探讨中国海军战略战术的文章。在浓厚的学术风气之下，中国不仅涌现出一批以陈绍宽为首的宣传西方海权理论、呼吁振兴中华海权的杰出人物^③，而且使“海权”（sea power的意译）一词

^① 史滇生：《中国近代海军战略战术思想的演进》，《军事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123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556页。

^③ 史滇生：《中国近代海军战略战术思想的演进》，《军事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123页。

深入人心。

然而，这一时期关于海权的探讨并不成熟。受马汉思想的影响，许多人将本具更多政治内涵的海权战略简单地归结为海军和“制海权”两个战略要素上。在强调海洋与中国的关系时，很多人都将强调“国家的兴衰，无不与海权有重大关系”；“海权问题，为中华民族解放的总枢纽所在”；中国经济发展“皆有赖于海上控制权”^①；“只有伸张海权，国家才能强盛，外贸才能发达”，而“发展海权唯一的办法就是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没有一支强大海军把握制海权，太平洋就永远不会太平”^②。

除了呼吁制海权外，民国海军界许多人还将马汉积极进攻的海军战略思想运用于中国的海军战略研究。民国海军部长陈绍宽在新的海军部成立后不久便提出了多层次海域作战的海军战略。该战略把海军作战区域拟订为敌海、近海和海岸三个由远而近的部分，提出了作战区域的选择以敌海为主，积极争夺制海权等海军作战任务。^③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海军界开始认识到中国海军作战的主要对象是日本，并将关于中国海军建设和作战计划的研究与对付日本的海上入侵直接联系起来。这一时期国内关于海权战略比较典型的研究成果，是发表在民国《海军杂志》第9卷第1期上的卓金梧的《海军战略要论》。卓金梧认为，中国的对日海军作战的关键在于夺制海权。战时“搜索敌舰队主力所在，一战而歼灭之”，或者将其封锁于港内，“是海军战略任务上的第一个目标”^④。

随着日本侵略野心的日益暴露和中国关于海军战略研究的深入，1934年，国民政府根据现有实力，并参照马汉的海权论的有关原理制定了《国防计划》。该计划专辟《海军》一章提出海军实战战略，将海军作为中国防御日本侵略的第一道防线。《国防计划》将海军的作战目

① 吕德元：《海军与国家之国际地位》、《海军与民族消长之关系》，（民国）《海军杂志》第8卷第4期，第22页。

② 高晓星编：《陈绍宽文集》，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305页。

③ 史滇生：《中国近代海军战略战术思想的演进》，《军事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第125页。

④ 同上。